

## 汪榮祖對王晴佳回應的回應

汪榮祖\*

我於三十餘年前就曾與文史界的一些朋友提倡書評寫作，然而這麼多年來，由於人情世故以及其他種種原因，華語世界裡的書評風氣至今仍遠遠不如西方世界那樣蓬勃。各類學術期刊，即使有書評，亦寥若辰星，聊勝於無。今次中研院近史所《集刊》改版，並大幅增強書評的篇幅，不禁令人望風鼓舞。學術書評不僅僅是與作者商榷，更有助於學術標準的建立，使草率與嚴謹之作有所區別，使出版品中可能有的錯誤事實、混淆的概念、不通的邏輯得到糾正，以嘉惠廣大的讀者。

我應《集刊》編輯委員會之囑，評論王晴佳的新著《台灣史學 50 年，1950-2000：傳承、方法、趨向》，雖集中評書，不提作者，但畢竟書是人所寫，難免不牽扯到人情。晴佳提到我們相識幾二十年，並儘量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，避免意氣，令人感佩。遺憾的是「意氣」仍然不斷外露，以致於視我的評論為「教訓」，為「文革」式的語言；說我的評論「似乎沒有討論什麼實質性的問題」，而又抱怨我「給予」太多，而他「愧不敢當」，客氣地拒絕了我的批評，甚至影射我的評論「為了展現自己的學問」。晴佳回應的心態以及他的「反唇相向」，我全能理解，也不以為意。但是他的回應引起更多的問題，必須要說清楚，講明白。晴佳所謂見仁見智，並不能迴避真假對錯；說一個沒有完成的學術計畫，「劃下了一個光彩的句號」，絕對是不

\* 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

合適的，絕無見仁見智的餘地。

寫一本五十年的台灣史學通史，理當對整體有所了解；我在評論時指出，若不能作「總體評述」，至少要對「整體有所觀察、有所了解、有所分析、有所識見」，尤其作者「希望能指出其發展的淵源、變化之原因和未來的趨向」，更不能不對半世紀以來的台灣史學有所「概括和評介」。晴佳在回應中卻說，他不作「總體評述」別有所指，因而說我的評論「脫離語境」，還加註說就是「斷章取義」，但因「言太重，此處不用」。說不用而實用之，何其高明；晴佳在書中所述，常令人感到「霧煞煞」，今更令人感到茫然不知斷了何章，取了何意？

歷史分期難以精確，只是為了敘事的方便，原本無多可議，並不是晴佳所說「實質」所在；可議的是從一期到另一期的發展、轉折與走向。晴佳可以只談五十年來的台灣史學，但卻不能說五十年前台灣沒有史學；殖民地時代的史學，就像殖民地時代的歷史，仍然是台灣的一部份。晴佳認為，這一部份的史學與五十年來的史學毫不相干；即使如此，也應有個交代，是否台灣史學在 1950 年仍然是一片荒蕪，必須「初創」？再說所謂「初創」的史學，既然於戰後來自大陸，就史學本身而言，已非初創，只是將創之有年的史學轉移到台灣；既然認為台灣史學是民國史學的一部份，便不能視為「初創」，更何況戰後是 1945 年開始的，為什麼到 1950 年才「初創」？初創在此乃作繭自縛的用詞，實在沒有必要再強作辯解。

傅斯年在初創時期提倡所謂「科學史學」，有其明確的內容；傅氏是要藉充分而可靠的史料，把史學建設成像生物學、地質學等自然科學那樣嚴謹的學問。此並非傅氏初創，早在 1903 年英國史學家布雷(J. B. Bury)就在他著名的演說裡宣布：「歷史是科學，不多也不少。」([history]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, no less and no more.)布氏所謂的科學，指的就是自然科學，他認為史家應據可獲致的史料，像自然科學家一樣，建立嚴密的歷史因果關係，這當然是無法實現的「高貴夢想」。因而傅斯年原想要藉史料建立的「科學史學」，

也不幸成為以史料編輯為主的「史料學派」，引起「乾嘉餘孽」之譏，才有 1960 年代以後走向社會科學史學的轉折。如果按照晴佳所說，科學史學成功地建立，而後有轉折，則成功建立的「科學史學」又是什麼？收集、編排、考訂史料也是「科學史學」？若然，則中國在乾嘉、在兩宋就有了「科學史學」？晴佳在回應裡仍不能理解此一轉折，令我困惑。他自己也用「社會科學史學」一詞，以與「科學史學」有所區分，卻混為一談，造成紊亂，以致於未能理解我提沈剛伯先生的用意。又說「胡適、傅斯年等人的科學史學，歸為民族主義史學的一種」，則又是什麼「科學史學」？晴佳如肯再想想傅斯年的科學史學何所指，就不至於說我的理解單一與狹隘了。

我認為一本總結五十年來台灣史學的作品，尤其標榜「傳承、方法、趨向」，內容應該講究均衡，然而晴佳在回應裡堅持「厚今薄古」有理，並舉司馬遷等人為例。太史公有鑒於上古渺茫，「薦紳先生難言之」，所以從略。晴佳「薄古」的理由，只是他「個人的興趣」。他的「古」很「近」，又標出「傳承」為主題，如何「薄」得？我所能想到的是，晴佳雖走訪了至少有 36 人之多，但已經訪談不到傅斯年那一輩人。晴佳說用了一百多種文獻，但就此題目而言，絕不能說多，只嫌少，是經過選擇的，而選擇難免不受到訪談的指引，更何況有些資料根本沒有好好去讀。所以，我在書評中才說，此書在相當程度上依靠訪談。晴佳若不依靠訪談，獨立判斷，文責自負，也不至於在回應中會擔心「連累」訪談者的聲譽。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他在回應裡把與我的「閒聊」，也算作訪談。我一直以為學術性訪談是很正式的，像口述歷史一樣，有一定的步驟與方法，希望他聲稱的 36 個以上訪談，不至於像我和他的閒聊那樣隨便。

我與晴佳閒聊時，的確提醒過他不能忽視何炳棣對台灣社會科學史學的影響，可惜他在回應裡仍然堅持何先生只值得他在一個小註中一提。晴佳似乎不知何先生另有中文著作：在香港出版的《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》，以及在台北出版的《中國會館史論》。何先生的兩本英文書，*Studies on the*

*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-1953* (《中國人口史論》)，與 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: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-1911* (《明清社會史論》)，前書最近才有中譯本，後書雖然至今尚無完整的中譯本，但英文本並不是障礙；據我所知，數十年來在台灣凡治中國社會經濟史者，鮮有不曾讀過何氏這兩本英文著作者，晴佳不妨對台灣的社會經濟史學者作一全面的訪談，看看有沒有人沒有讀過何先生的書。就是為晴佳作序的許倬雲先生，所著 *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: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, 722-222 B. C.* (《先秦社會史論》)也受到何先生英文著作的啓示與影響，並在序文裡「非常感激 P. T. Ho 教授的鼓勵」(頁 viii)。

晴佳在回應中又說：「何先生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，並不喜歡在台灣各大學演講」，根本是道聽塗說。記得早在 1959 年我在台大讀書時，何先生就曾在文學院二樓的大教室講演中國人口問題，由沈剛伯院長主持，教授與學生濟濟一堂。1965 年何先生訪台，報章曾大篇幅的報導（我尚留有剪報），前兩年何先生到南港作「蕭公權講座」之餘，又到台大作了一次公開演講。這僅僅是我所知的演講，何先生在台灣演講應絕不僅此。何先生並沒有不喜歡在台灣各大學演講，則所謂「眾所週知的原因」，就令人費解了。就社會科學史學而言，何炳棣對台灣史學界的影響絕非黃仁宇所能比。何氏於 1995 年由聯經出版的《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》一書，就是獻給包括台灣在內「已故、健在政治中國經濟、社會史的三代學人」。何炳棣豈僅是美國的「漢學家」而已，何況何先生一向不以漢學家自居。

晴佳在回應中提到李敖，說是「其志博大，並不會棲身於區區史學界」，這是客氣的說法，如肯坦白地說，就是李敖與史學無關，所以不提。其實，晴佳在書中談鄉土文學時提到的那些人，恐怕也不會棲身於「區區」史學界罷。李敖不僅是史學科班出身，他的大學畢業論文有關宋代婚姻法的研究，已見他在史學上的功力，他受到胡適與姚從吾的青睞，不是偶然的。他所寫的《胡適研究》、《胡適評傳》、《孫逸仙與西化醫學》等書，難道不能算

作史學著作而一筆不提？他又是 1960 年代台灣中西文化論戰的主角，論戰的內容也不能說與史學無關。固然，李敖「其志博大」，不願作專業史家，但他強烈的社會與政治批判，也未嘗與史學無關。也是台大歷史系出身的楊照，就有慧眼在文章中寫出李敖言必有據的「罵人」風格，具有乾嘉考據的功夫。李敖是台大歷史系同學中最特立獨行之人，整個中國大陸史學界也沒有出過這一號人物，應是史學史作者饒有趣味的題材，可惜晴佳不以失之為憾。

最出我意表的是，晴佳在回應中說我「提拔」錢鍾書為史學大師，真不知今日誰能「提拔」錢先生。晴佳認為我仿照錢先生的文體（俗稱文言）寫書，就是「儼然把錢鍾書視為當代一史學大師」，這種邏輯實在難懂。晴佳如果翻過《管錐編》，應知錢先生如何討論史學經典，以及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他為什麼不能涉足史壇？史學家是否也可以涉足文壇？以史學史研究為專業的人都知道，無論從中外史學的舊傳統到後現代，文與史有密切的關係。文學家論史，一定要「提拔」他為史學大師嗎？我曾長篇介紹錢鍾書對史學的看法，明言「鄰壁之光，堪借照焉」，也就是說，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錢鍾書，他的史學觀點值得史學家們參考。晴佳應悔失言才是。

晴佳以旅美大陸學者，研究台灣史學，寫成專書，其自信值得肯定。但是我深感此書所述，過於片面，有欠深入理解與仔細查證。我在書評中只論擎筆大者的實質問題，許多細節都沒有提到，例如，晴佳誤以為胡適研究《水經注》是為了「考訂版本」（頁 16），不知他實為審判戴震是否抄襲趙一清《水經注》校本此一公案，目的是為了白冤止謗。杜維運的《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》一書，內容是針對若干西方史家誤解中國史學而有所辯正，並不是如晴佳所說：「希圖在西學衝擊的背景下探討中國史學發展的前景。」（頁 68）類此未讀原書而驟下斷語，也應該是屬於嚴肅的「實質性」問題，不容輕忽。